

## 与中国现代文学结缘四十载

——访安必诺、何碧玉

钱林森 赵维纳

同年同月出生的安必诺（PINO Angel, 1954.5—）先生、何碧玉（RABUT Isabelle, 1954.5—）女士，为当代法国汉学界专攻中国现代文学的知名汉学伉俪。安必诺，1992年获巴黎十三大经济学博士，后转学汉语，毕业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曾任波尔多蒙田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该校中文系教授、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世纪80年代，他专事当代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研究，曾有多种著述问世，后研究巴金和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著述有《无政府主义者巴金》（*Ba Jin anarchiste*, 2014）、《法译现当代华文文学作品总目》（*Bibliographie générale des oeuvres littéraires modernes d'expressions chinoises traduites en français*, 2014）、《东方语言学院百年汉语教学》（*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与白吉尔 [Marie-Claire Bergère] 共同主编，1995）等，译有巴金《随想录》、杨绛《丙午丁未》，并与何碧玉教授合译巴金《灭亡》、池莉、余华等当代作家作品，共同主编《京派海派作品选译》、《京派海派研究文集》、《中国文学丛书》、《台湾文学丛书》多种。何碧玉，1980年毕业于巴黎高师，主攻古希腊文学，后改学汉学，1992年以沈从文的文学创造为题，获汉学博士学位，曾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现为该系教授，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主要编著有《中原国土上的美丽叛译：现代华语世界中的翻译实践与问题》（*Les Belles Infidèles dans l'Empire Milieu: problématiques et pratiques de la traduction dans le monde chinois moderne*, 2010）、《现代中国与西

方：翻译与跨文化协商》（*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Mediation*，与彭小妍共同主编，2014）等，除与安必诺共同主编京派海派、中国文学等多种丛书外，还译有沈从文《边城》和池莉、余华、毕飞宇等当代作家作品，著译甚丰。

我和安、何这对知名的法国汉学伉俪，相交相识久矣，且一直心怀敬意。特别是在近十年内，每当我因学术研究的疑难而与他们通邮求助之时，总让我能及时解疑、受益良多，因而一直在内心里期盼着能有机会与其现场交流，当面问教。今年三月末四月初，安、何夫妇利用其来苏州大学参会、访学之机，于4月5日至6日，特来南京造访老朽，使我们得以在一起相聚叙旧、直面交流，成全了我多年的夙愿，也促成了如下的对话访谈。4月5日上午他们从苏大乘高铁来到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下榻旅店稍事休息后，就双双应邀给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研究生们做了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国的接受”（安必诺教授主讲）和“20世纪20—30年代旅法的中国作家”（何碧玉教授主讲）专题讲座，与我院年轻学子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了热烈欢迎。4月5日上午九时许，安必诺、何碧玉教授又不辞辛劳在其下榻的宾馆与我和他们的弟子赵维纳女士，就其四十年的汉学旅程之所见、所思与所获，进行了面对面的深度交流，传经解惑，历时近四个小时，使我深受感动和启迪。如下文字，是由赵维纳女士依据当天现场录音、手记翻译梳理，再由我几次悉心修改补正后，经何碧玉、安必诺教授两度过目，发表于此，以飨我国读者。安、何伉俪不畏旅途劳顿，来宁造访，慨然赐教，维纳女士排除一切困难，一路陪同，成全了我们久已企盼的专访，在此一并顺致谢忱。

——钱林森，2017年8月1日，南京秦淮河西

## 一、我们的中国情缘

钱林森（以下简称“钱”）：何碧玉教授，安必诺教授，你们好！

我与二位虽相识很久，且心存钦佩有年，但一直以来却尚无机遇和你们一起深谈交流，向你们现场请教。今日有缘再相会，我想以二位卓具特色且成绩斐然的汉学之旅为中心话题，以及你们在译介与研究中国文学的跨文化探索的经验和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交流、访谈，问教于两位汉学教授。我们知道，二位作为法国汉学界 20 世纪 80—90 年代涌现出的引人瞩目的一对汉学新秀、知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而你们步入汉学界的举步之旅，并非始于汉学，安必诺先生首攻的是经济学，何碧玉教授则是法国古典语言文学，专攻法国文学、拉丁语、古希腊语。请问：是何种机缘驱使二位专攻汉学为终身职业？

安必诺（Angel Pino，以下简称“安”）：我的首个专业是社会经济史，与汉学结缘，说来话长。我之中国兴趣，始于 1978 年末的魏京生事件，我开始对发生在当时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事情产生了广泛兴趣，遂与朋友们合作研究相关的书籍、作品。自此，我才开始研究中国。当时，我并不是中国研究专家，我研究的主要是苏联。从这时候开始，我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学习中文。之后，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我中国研究的导师。我不知道您是否认识他，他叫陈庆浩（钱：认识，和他很熟，他是《红楼梦》研究专家，知名的域外汉籍研究专家，我读过他的著作），不错，他是一位红学家。他年轻时住在香港，1968 年到法国，为的是到波尔多来完成一项研究计划，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宋史研究计划。原是由旅法的匈牙利汉学家艾蒂安-巴拉兹（Etienne Balazs）发起的。后来巴拉兹去世，需要一人与法国汉学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一道做这项研究。于是陈庆浩来到了法国，并且一直待了下来。他在 70 年代初开始在 CNRS 工作，他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因为他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很熟悉。比如说，他也完成了一个和您类似的很庞大的研究计划（projet），他搜集编辑出版了一本包含了所有中国黄色小说的文集，他找到了一些未出版的很古老的手稿，一些未出版的小说。他做的最后一项计划，是收集所有域外非华人，如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用

中文写就的作品数十集丛书。当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正在研究中国，是他让我对中国感到特别的兴趣。我开始研究的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对中国作家感兴趣——但不是真正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事业，比如，我对巴金和杨绛的生活感兴趣，关注巴金，特别是巴金的青年时代，开始他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非常追求自由的人，后来他成了知识精英（Intellectuel élite），巴金写给法国耶稣会士明兴礼（Jean Monsterleet）博士的三十来封书信原件，就是我发现的。巴金在“文革”中受到打击，非常痛苦，“文革”之后他重新开始写作，对“文革”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这让我很感兴趣。于是，我读他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巴金发表的《随想录》吸引了我，我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开始研究起中国文学来。之后我遇到了我的夫人，她跟我很不一样，她非常“文学”，我只是个“假文学”。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关于这个国家发生的什么事情。比如余华，我对他感兴趣的地方在于他对中国的看法，而不是写作手法。何碧玉（Isabelle）则是对文学本身感兴趣。

**钱：**很有意思，你们真是配合默契，令人钦羡。难怪呢，你们夫妇俩是互补的，这让我明白了两位何以有如此亲密恒久的合作，为何日后在汉学研究，特别是在引介和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肩并肩的两个人比一个人更有力啊。安必诺先生1978年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侨居法国的华人学者陈庆浩，安必诺先生的夫人何碧玉教授引领他走向汉学之旅。那么请问何教授，你是怎么与中国相遇、结缘的呢？是何时开始学习汉语的呢？你首个专业并非汉语和中国文学，想必也会有一个有趣漫长的故事吧。

**何碧玉（Isabelle Rabut 以下简称“何”）：**我的第一个专业是古典语言文学，主要学习内容是法国文学、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从法国高等师范大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二十二年（1976）才转学汉语，后来又来到北京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第一外国语学院（后更名为北京

外国语大学)工作了六年时间。与中国相遇、与汉学、中国现代文学结缘,确实有一个有趣而漫长的故事。我是1976年开始学习中文的。当时我刚刚通过中学任教资格考试(agrégation),这是法国中等教育中最高级别的考试。所有高等师范大学的学生都要通过这项考试。不过,当时学生们被鼓励学习其他课程。其中一个原因,我想是因为古典学正在走下坡路,古典文学研究没有多少前途。虽然我希腊文学得特别好,有可能在大学教授希腊语,但是我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都要去中学教书,这并不吸引人。所以学校的领导部门鼓励学生去学习一些东方语言或者去上国立行政学院(ENA)的预科。因此在高师,学生可以学习阿拉伯语、汉语和希伯来语等等。1976年,我开始在Rue d'Ulm高师男校学习中文,当时分男校和女校。在这所学校,是保尔-巴迪(Paul Bady)先生(钱林森:他是研究老舍的专家)教的我中文。是的,他和我一样,都是学习古希腊语出身,然后转专业学中文,主攻汉学,是老舍专家。在Rue d'Ulm高师男校,他教着一门课程,不过并不是语言课,而是关于毛泽东的。不过还有专门教中文的外教,她叫白月桂,她是汉学家于儒伯(Robert Ruhlmann)的朋友。我不会写她的名字,她是华侨吗?(钱林森:是的,她是中国在东南亚的华侨,我认识他,跟她很熟。)所以她的发音不太标准。总而言之,在高师男校,有两门中文课程。一门是巴迪(Paul Bady)授课,但不是语言课;另一门是白月桂女士教的语言课。我很喜欢她,她让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我就这样开始了中文学习。虽然这一年,我并没有学习多少中文,因为这不是一门正式的课程,不过它对我很有益处。后来,我去了美国一年。1977—1978年,我在Smith college女生学校教法文。这是一所常青藤学校,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在那儿,我继续学习中文,学校有中文课,教课的是一位孔老师。时间不长,一周两小时四小时的样子。我用的是耶鲁大学的教材,是用繁体字写的,教材很好。这套教材有两册,一册是没有汉字的,专门介绍语法,另一卷是教汉字书写的。后来我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做教材的时候借鉴了在

美国学中文的经验。在 INALCO，学生是一开始就学写汉字的，书写和语法是同时进行的。美国的教学方法则不同，非常有效，教语法的那本书没有汉字字符，即使学生不知道汉字怎么写，也能很快学会正确说出句子。我没有学太多的汉字，但是却学会了语法，学会了如何组织一句话。现在在法国，很多教材都用了这样的方式：区分口语部分和书写部分。后来，我 1978 年回到了法国，一直都是在在校学生身份。高师的学制是三年，但是可以申请第四年甚至第五年，我因为成绩优秀，所以申请到了第五年，因此 1978 年的时候我还是高师的学生。这一年，我在 INALCO 办了注册，继续学中文，因为对它感兴趣。由于已经在美国有了一定的中文基础，我直接注册了二年级，不过一年级的期末考试还是要参加。但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当时我既不会拼音，也不会简体字。因为在美国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而是用的美式韦德注音法，汉字也都是学的繁体字。我必须尽快补习拼音和简体字，因为已经是二年级了，同时我在做一篇关于古希腊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从 1976 年开始写的。之后的两年我在做这两件事：在 INALCO 学中文，写论文。我甚至还在巴黎十二大为初学者教古希腊语。到了 1980 年，我不能继续待在高师了。马上在大学获得古希腊语教职的机会很少。这意味着我得去初中或高中教课。于是我产生了去中国的想法，这样就可以不用去中学教课了，并且我对中国很感兴趣。我去了 Chevilly-Larue 的中国大使馆的办事处，我在那儿遇到了一个人，我说我想去中国教法语，她推荐了一个长沙的职位。我几乎准备去长沙了。然而 INALCO 有一位姓王的老师，她没有接告诉我不要去长沙，而是建议我去北京。他知道长沙当时的生活很困难，城市也很闭塞。一个外国人去了会感到很孤独。所以他建议我申请去北京。我申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作为外国专家教师，月薪 500 元，教学生法语。这是很高的工资，当时的工资一般就是 50 多元。这笔钱对中国人来说很多，但对于法国人来说很少。我本来只想待一年，然而我很喜欢这里，一位法国同事建议我申请法国外交部提供的一个教职，薪水是三倍的法国薪金，简直

是一笔巨款，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位子了，因为法国政府负担不起。在北外，有三四个法国人是以这种身份来中国的，作为法国政府雇佣的老师。在北外、北大和上外都有。于是我从北二外转到了北外，在那里待了五年。我没想到能待这么久。我教法语，法国文学，甚至教研究生的拉丁语。但是我没有决定改变研究方向，成为一个汉学家。我还是希望能在法国的大学里面取得一个古希腊语职位，因为我已经写出了一篇相关主题的论文。不过到了1983、1984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古希腊语已经荒废太久了，我应该转变方向。1985年的时候我打定了主意专攻中文。我决定写一篇关于中文的论文。1985年夏天，我决定联系能够指导我论文的老师，当时这样的人很少。我联系了米歇尔-鲁阿夫人（Michelle Loi），她是教授，也是从高师毕业的（比我年长28岁），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她建议我写一篇关于鲁迅的论文。主题是《两地书》，许广平和鲁迅之间的通信集。她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批评。我开始读这本书。一开始我觉得很难，里面写了很多关于两人生平的小事，很复杂。许广平是广东人，有时候用的并不是标准普通话汉语。我不喜欢做这个题目，从文学角度看，它没有多少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它们只是书信，是关于鲁迅本人的。所以我给鲁阿（Loi）夫人写信，告诉她我不想做这个题目。巴迪先生本来也可以指导我，但是1985年他还不是教授，只是副教授，没有资格。我当时不太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四年级才有现代文学课，我只上了二三年级，我没上过中国文学课。没有任何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在中国也没有上过文学课。我选择中国现代文学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我先生所说，我是很“文学”的，我喜欢文学，其次古典文学对我来说太难了所以我选择现代文学。我和中国朋友讨论，他们推荐了自己喜欢的中国作家，比如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这些纯文学的作家，而不是茅盾、郭沫若这些人。我开始看这些作家的作品，最后选了沈从文。然后我去找能够指导我论文的老师，我了解到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有一位毕莎（Bissat）

教授，但之前我并不认识她。我们通过书信联系，我注册 INALCO 的时候是 1985—1986 年，当时我还在中国。1986 年 2 月我去了湘西，还在北京见到了沈从文，在他家里，在崇文门附近，还见到了张兆和。我还见到了两个和从文先生一起搞研究的人，王亚荣（Wang Yarong）和王旭（Wang Xu），他们都是丝绸专家。我开始研究沈从文，很困难，因为开始我的中文不够好。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十二本沈从文文集我都读了，沈从文的中文很难读，我很喜欢他的文字，很美，但真的很难。因为这六年我一直在教法文。我真正学习中文的时间也就是美国的一年，INALCO 的两年。在中国我没有上过中国老师的中文课，也没有什么机会和学生、同事讲中文。当时审查很严。有些人都不想去友谊宾馆跟我见面，而是约其他地方见。去友谊宾馆要登记，经常接触外国人被认为是很危险的行为。北外倒是给我指派过几个学生帮我学习中文，其中一个叫作左思的朋友，跟我很要好，现在她在法国，已经二十多年了。我用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中文，我试着阅读和翻译，不明白的地方我请教她，就这样我进步了。后来她建议我读一些更文学的作品。开始我读的不多，每天读一两页，不放过每一个不懂的地方，但进步很慢。我认为基础很重要。基础打好了后面进展就很快。1986 年我回到法国，我不想马上在中学教课。我申请了一段时间的休假，由于我是公务员身份，所以必须教课或者请求休假，我在大学没有找到位置，所以必须在中学教课。我休了一年假，就被 93 省的 Roissy 机场那边一所初中聘请。法国教师是不能自己选择去哪里的，很多时候会被派到巴黎郊区，作为一个未婚年轻老师，去巴黎或者南方教书是不可能的。总是被派到比较困难的地方，比如巴黎北郊。那里的学生有很多出身贫寒的孩子，很难管教。我教初中二年级、三年级的法语和拉丁语，直至 1988 年。在此期间，我同时在东方语言学院（INALCO）教翻译课，我教这门课教了两年（1986—1988）。我在东方语言学院没有正式岗位，不是教授或副教授，我只是任课老师，教一门课，就是汉译法翻译课。第二年我认识了我先生必诺（Pino），我是他的老师，他当时是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四年级

学生。我教的是一门本科（Licence）课程，听课的学生很多，超过一百人。1988年后，我得到一个机会去了波尔多大学教中文，这个职位是时任波尔多大学东亚系主任雷威安（Andre levy）教授负责招聘的，他对我的简历很感兴趣，因为我是巴黎高师毕业生，学的古典文学，在中国待了六年，很信任我，于是让我教授中文。这是我大学教授生涯的开始，一直到1991年，1991年我去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执教。1997年我晋升教授，一直到现在。

钱：真没有想到，你们的中国之旅和汉学因缘，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学术经历，也未曾料想到，你们由不同专业方向通往汉学征程中，竟有如此美妙、奇缘佳遇的故事，今日有缘由两位一起向我们亲口讲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让我们仿如重返你们那火红的青春岁月年代，走进当年你们主攻汉语的学术现场，目睹到你们手拉手、肩并肩，举步前行的身影，真是又感动又惊喜、且倍感亲切、受益良多啊，多谢了。



访谈现场留影（左起：安必诺、钱林森、何碧玉）

## 二、沈从文、巴金，京派和海派

钱：你们两位分别从各自的专业，社会经济学和法国古典语言文学（古希腊文学），转学汉学、汉语言文学之时，更确切地说，转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和研究的时期，请问你们首先接触到的中国作家是谁？读到的是哪部作品？你们第一次正式发表的翻译或研究作品是什么？

何：我首先接触到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我最早翻译的是《从文自传》，1986年从中国回法国之后就开始翻译了。我向很多出版商推荐这部作品，但是它的出版遇到了一些困难。后来我又翻译了《边城》，因为出版一部小说相对容易些。出版是1990年，由阿尔邦-米歇尔（Albin Michel）出版社出版。《从文自传》也是在这个出版社出版的。我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篇幅很短，叫《张爱



沈从文《边城》法译本书影

玲生平简传》，收录在雷威安（Andre Levy）主编的《中国文学辞典》，属于传记辞典。这本辞典又隶属贝阿特日思-迪迪奥尔（Beatrice Didier）总编的《世界文学辞典》系列，中国部分是雷威安编写的。后来分开出版了不同国家的文学辞典，比如中国文学辞典、日本文学辞典、古希腊文学辞典等等。这本中国文学辞典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家介绍，也有一些专题论文，比如用中文写作的越南文学作品、《红楼梦》等等，主要是古典文学，但也有现代文学。《张爱玲生平简传》是我

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文学的文章，之后我写过很多研究沈从文的文章，以及其他中国现当代作家和作品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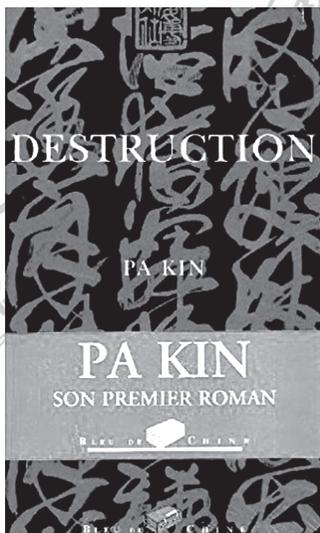
钱：安必诺先生呢？你首先读到的，应该是巴金的著作吧？首先翻译的作品也是巴金的吗？

安：是的，我第一次读到的是巴金的作品，我翻译的第一部中文作品，是巴金的《随想录》。我是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其中几篇散文翻译，后来在“中国蓝”（Bleu de Chine）出版了我翻译的《随想录》选集。同时，我也翻译了杨绛的《丙午丁未纪事》，篇幅不长但是很精彩。可当时并没有马上出版，出版商克里斯提昂-布尔瓜瓦（Christian Bourgois）回复我说有人刚刚翻译了这篇散文，因此无法出版。我为此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寄给了很多出版社，比如加利马（Gallimard）、弗拉马利庸（Flammarion）、菲利普-皮基耶（Philippe Picquier）等等。除了皮基耶（Picquier），其他出版社都愿意出版。这时候布尔瓜瓦（Bourgois）给我来信说之前是个误会，并没有人翻译这篇文章，于是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总之很多出版社都愿意出版这部作品。它讲的是作者对中国“文革”的人性的反思，杨绛在书中更想要展现人性中良善的一面。就是说，有些人不会参加“文革”中的互斗。她和钱锺书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坏人。巴金和杨绛很多文章写的都是关于“文革”的。我感到写得很好，很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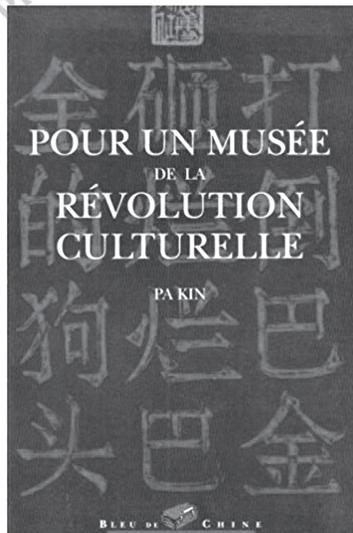
钱：在20世纪中法文学交流史上，巴金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也是较早引起法国学界关注、研究的中国作家，明兴礼博士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便是研究巴金的首部专著，也是法国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第一部著作。必诺先生对巴金的兴趣，也许与巴金的影响力有关吧？你是当代法国巴金研究的知名学者，近几年来我就陆续读过你的《巴金在法国的传播接受》、《巴金：从巴黎到沙多·吉里》等相

关卓具特色的巴金专论。请问：你为什么要首选巴金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你与巴金相遇，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机缘呢？为什么对巴金感兴趣呢？

安：巴金激发我的兴趣，确实与他在近代法中文化关系史上的影响分不开，我与巴金相遇实出于一种“机缘”。首先因为他早年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当时对无政府主义很感兴趣，我写了很多关于到过法国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介绍文章，比如翻译过左拉的毕修勺。我在一本无政府主义辞典中写过他的词条。我之所以对巴金感兴趣，是因为他一度在法国被视为最重要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我对他的生平感兴趣，我发现他笔名的第一个字“巴”，并不是像法国人通常认为的那样取自“巴枯宁”，而另一个字“金”的确取自“克鲁泡特金”。我开始的时候对这个很感兴趣。后来我渐渐对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产生了兴趣，将它列为首译的作品。我们两个人合译了这部小说，不仅翻译小说，而且翻译了巴金所有谈这部小说的文章——讲他自己为什么写，如何来写这部小说的文章。我们为这部小说拟写了一份长长的附录。我对他感兴趣，首先是觉得他的人生轨迹非常有意思，他的人格也非常有趣。尤其是在法国有很多传言，比如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说他背弃了无政府主义，我想要了解，为什么巴金最终会选择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我对他感兴趣，完全不是因为文学。不论怎样，他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很棒的作家，他的文笔并不好，但写出来的东西有些却特别特别的好。我觉得终其一生，他的文笔并无大的进步。他不是一位文体作家，但是写出来的某些片段却非常精彩、震撼。总之，他不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但是某些地方的文笔却非常精彩。于是我们想要把他的《随想录》全部翻译下来。我们已经翻译了120篇，全书是150篇。



巴金《灭亡》法译本书影



巴金《随想录》法译本书影

钱：很显然，你们作为当代法国著名的汉学伉俪，通向中国的路径却不尽相同：何碧玉女士由法国古典语言文学启程，直通中国，来华执教六年，由法国文学到中国文学，直接抵达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安必诺先生与中国相遇，更多关注的是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从关心中国政治出发，与巴金相逢，为巴金早年政治信仰和晚年“文革”中受的磨难所吸引，进而研究巴金、关注中国文学，与何女士相识、投缘，成为翻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家和巴金研究专家。二位作为法国汉学界翻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名学者、翻译家，首部合译作品是巴金的《灭亡》，后来你们合作翻译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有谁呢？比较著名的，我记得，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读到过，是《京派海派作家作品选》吧？

何：是的，这是由阿尔邦（Albin Michel）出版社出版的《京派海派作家作品选》。还有杨绛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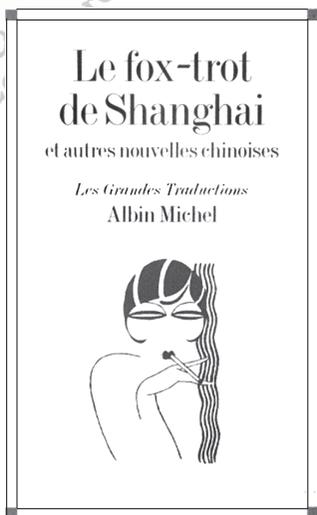
钱：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与北大教授严家炎教授等合作的成果，是吗？

何：那是另外一本《京派海派研究文集》，是与北大严家炎教授，北京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李进（Li Jin），巴黎三大张寅德，加利福尼亚大学史书美（Shu-mei Shih）等和我们一起合作的，是2000年由巴黎中国蓝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研究论文集。我们翻译了他们写的研究文章，不过不是文学翻译，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写了研究文章。

安：我们想要同时做这两件事。因为这些论文研究的作家都是法国人不可能读到的，因为没有人翻译他们的作品。所以，我们需要同时撰写研究他们作品的论文，并翻译他们的作品。这样人们才能了解这些作家。类似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比如对于台湾地区的作家，我们同时出了一本研究论文集和一部作家文集。这样人们就可以评判我们研究的作品了。



《京派海派研究论文集》



法译《京派海派作品选》书影

钱：这是个好主意。谁出的呢？

安：（莞尔一笑）大部分是我的主意。

钱：太了不起了。这可以让法国读者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面貌。真是个好主意，太好了。你们从事这方面的译介和研究，当然要与中国相关专家联系、合作了，比如严家炎教授，他就是这方面的大家，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对中国现代文学流派非常熟悉，对中国乡土文学、京派、海派，都有精深的研究。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在北京大学给我们讲授柳青《创业史》满堂叫座的情景，至今还令人难忘。当时他是年轻的教授，我是年轻的学生。80年代不久，我又读到严老师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著作，印象深刻，这是题外话。我们回到京派海派的话题上来：这些京派海派作家，你们对他们的风格、流派和美学追求有什么认识、研究和评价呢？

何：从文学角度看，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棒的作品。其他作家作品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味道很浓，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文学性上还是京派海派作家更胜一筹。沈从文、萧乾、林徽因、林淑华、废名、穆时英，他们的作品都很独特，是非常纯粹的文学，不是为了表现什么，或是推动社会进步，文学性特别强。其他作品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基本都是“五四文学”，社会文学，战斗性非常强。我们之前对中国文学只了解这些，但是京派海派文学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的另一面。我们之前只知道叶圣陶、茅盾之类。

安：我们在筹备编译这些书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京派海派作家，比如萧乾、汪曾祺。这要感谢北大严家炎教授的引荐。

何：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必须了解京派海派。

安：可是，他们当时在法国都不为人所知。

钱：其实在当时的中国，也并不为多少中国读者所知。惟其如此，你们对京派海派的译介和研究，就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何：确实，京派海派的研究，以前在中国也不多见。严家炎教授等人 80 年代才开始发现他们。研究他们的历史还很短呢。八九十年代之后就有很多中国研究者研究京派海派作品了。但在我们开始研究他们的时候，这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钱：那么请教何碧玉教授，在这些京派海派作家中你最喜欢、推崇的是谁呢？文学价值最高的是哪些作家呢？

何：我觉得萧乾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作品不多，名气也不大，但是真的很出色。他是个记者。“二战”期间，他在英国当了十年战地记者。我很喜欢他。林徽因的诗很美。我们还没翻译过她的诗，她是徐志摩的恋人。她写的东西太美了！林淑华也是个很好的作家。

钱：你呢，必诺先生？

安：我更喜欢海派作家，比如穆时英。我喜欢上海作家。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兴趣：一位法国作家保尔-莫朗（Paul Morand），我很喜欢这个作家——尽管他不是个亲善的人，海派作家深受他影响。

何：但我觉得海派作家的作品模仿痕迹有些过重了。比如施蛰存，他受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影响就很深。我很喜欢京派作家的作品。他们的表达事物的方式非常深刻，有时甚至残酷，但同时又非常散漫、平静。这就是他们的风格。朱光潜和京派作家走得非常近，比如沈从文。他写的《谈美》。京派作家的风格和朱光潜的风格是一致的：我们应该总是用平和的方式叙述事物，不能带着太多的情感。事实上这是很有效的。思想是一面镜子，不应该被打扰。沈从文也说过类似的话：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是对京派风格最好的总结，非常哲学，也非常中国化，同时也很现代化。我写了一篇关于京派的论文，谈了京派作家的风格。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风格虽然平静，却不乏味。林淑华写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浓重的悲剧色彩，但是叙述方式又是那么平静和漫不经心。沈从文也是，他写了很多比如砍头、鲜血淋漓的场景，

但也是漫不经心的。沈从文觉得巴金太容易激动了，浑身都是火。写作应该平静，而不是激动。这里面藏着中国思想的根源，也许是佛教或者道教的，我不是很清楚。我很喜欢朱光潜。首先他的语言美轮美奂。他的文字很美。用简明的白话文写成，阅读起来特别容易，同时又有些古典。朱光潜文化修养深，他知道一切从古希腊到今天的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并经常和中国文学作比较。他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学者。

钱：二位对京派海派各有喜好，且多有独立之见，这很好。译介或研究京派海派的法文著作，现在还可不可以购买到或下载到？

何：阿尔邦（Albin Michel）出版社的可能已经绝版了，需要联系出版社。在法国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很难很难。之前 Albin Michel 有一个和我们关系很好的丛书主任，人很聪明，思想开明，出版了两本沈从文的书。本来他也同意出版京派海派的作品，可惜在这之前他突然去世了。他的继任者不怎么想出版这本书。不过最后还是出版了。当时我担心出版计划会搁浅。出版这样的书并不容易，他们都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不知名的作家。销路并不好，出版很难。

### 三、池莉、杨绛、余华

钱：继京派海派作家作品之后，二位合作翻译研究的现当代文学，还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新时期出名的女作家池莉的作品。中国新时期文学女性文学取得了众口皆碑的突出成就，引起了法国汉学界的兴趣和重视，因而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引进与介绍中，女作家的作品占据重要的比重。据我所知，1983 年，法国女作家苏珊娜-贝尔纳（Suzanne Bernard）率先在巴黎出版了由她作序的《中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La Chine des femmes, nouvelles, Mercure de France, 1983.*

Avant-propos de Suzanne Bernard), 选译了丁玲的《牛棚小品》、冰心的《空巢》、湛容的《人到中年》(节选)、茹志鹃的《草原小路》、张洁的《森林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等六篇小说故事。1984年,由雅克琳娜-德斯波鲁娃夫人和敝人合译、由米歇尔-鲁阿夫人作序的一部中国女作家七人选短篇小说集《天生是个女人》(*Nous sommes nées femmes*, Anthologie de romancières chinoises actuelles, traduit du chinois par Jacqueline Desperrois et Qian Linsen, avec la contribution de Michelle Loi. Paris, Indigo & côté-femmes éditions, 1994), 译介了茹志鹃的《儿女情》、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的《夏》、叶文玲的《心香》、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航鹰的《金鹿儿》和问彬的《心祭》等七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除茹志鹃的外,都是80年代涌现出来的知名女作家作品。池莉是改革开放后,一位很著名的武汉女作家,具有浓重的楚地特色,卓具风格。二位译介她,想必有你们自己的文学喜好和审美考量?是否也是由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所吸引呢?

安: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译介是研究必备的手段和方式,翻译作品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我们会大量阅读,依据自己的喜好和判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家作品推荐给出版社,并亲自进行译译,翻译池莉,自然也不例外。

何:是这样。首先,我要说,我对女性文学本身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并不在意一个作家是男还是女,我不是个女性主义者。池莉的作品并不全都是我们翻译的,我们翻译了一部分,包括《云破处》、《预谋杀杀人》、《你是一条河》、《太阳出世》和《看麦娘》。关于池莉,我喜欢她身上一点,就是她的大胆,她谈的不是政治,而是日常之事,却是我们不经常谈论的东西。比如,她有一本书,因为书名的缘故,在中国激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了快感你就喊》。它已经翻译成法语了。书里谈的是“男人的问题”,不是“女人的问题”,它讲的是男性的处境,谈的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面对老板、妻子,等等。我觉得这很好,因为之前没有人写这些。我们总是写女人遭遇的问题,觉得男

人没有遭遇什么问题。她却告诉我们，在中国社会身为男人也不容易。男人们也在生活中收到各种碾压，他要扮演各种角色，面对来自上司、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压力。这很大胆。还有一本小说《太阳出世》，写一个女人怀孕、生子，还有孩子周岁之前发生的事情，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写这些事情的小说——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她写的主题都是很少有人谈的，而且她写得很好，非常直接。我觉得这很有趣。比如怀孕的场景，很有意思，所有女人都在场，产妇叫嚷着，护士说你之前就应该想到你今天会叫啊，这样的话。非常残酷，但也很有意思。可能这是女性作家的特点，我们总是说，男人总是谈论“大主题”，比如社会、大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等等；女人谈论“小主题”。我挺喜欢这点的。

**安：**说点题外话。在法国，小说阅读者 70% 都是女性。所以，女人总是对谈论她们的作品，即女性文学，由女性作家写作的文学作品感兴趣。所以，池莉的作品在法国还是非常畅销的。

CHI LI  
TROUÉE DANS LES NUAGES



ROMAN TRADUIT DU CHINOIS PAR ISABELLE RABUT ET SHAO BAOQING



池莉小说《云破处》法译本封面

CHI LI  
SOLEIL LEVANT



ROMAN TRADUIT DU CHINOIS PAR ANGEL PINO



池莉小说《太阳出世》法译本封面

何：比如她的小说《云破处》就非常畅销。小说的主题在中国是禁忌，讲的是一个丈夫婚内强奸妻子的故事。从来没人写这样的故事。池莉写了。我觉得她很直接，写很多人不敢写的事，而且不是大主题，是小主题。作品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人把小说《云破处》编排成了戏剧，在巴黎上演，演员都是法国人。他们邀请了池莉观看了演出。这是非同寻常的。这本书非常畅销，销量20000多册。真的是非常畅销。不只是对中国文学，对世界文学来说，谈论这种主题都是很大胆的。我觉得她观察中国社会的眼光非常智慧。她谈论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人们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事情。她准确地抓住了很多要点，笔调讽刺又咄咄逼人。人们很喜欢她的作品，喜欢她的笔调，直接又咄咄逼人。她也相当有个性，广受法国受众的青睐。

钱：这么说，你们翻译出版的池莉小说在法国读者群受到了热捧，是吗？

何：是的。我们马上就要出版她的另一部小说。目前出版的她所有的小说都卖得不错。第一部出名的作品是《烦恼人生》。讲一个武汉工人的二十四小时。这是一部中篇小说。我觉得这是一项优势。人们并不喜欢读很长的小说。池莉的书篇幅正好，不太长，所以卖得很好。

钱：女作家杨绛也是你们合作翻译的吗？比如《干校六记》？

何：《干校六记》不是我们翻译的。

安：《干校六记》有两个法文译本，但不是我们翻译的。

钱：你们翻译她的是？

何：我们翻译的是《丙午丁未》和《杂忆与杂写》，后者是一本散文集，由布尔瓜瓦（Bourgeois）出版。他是钱锺书夫妇的好友，他出版了《围城》，还有杨绛的三本书。但后来出于某种原因，杨绛不希望再和布尔瓜瓦（Bougois）打交道，不希望他继续出版他们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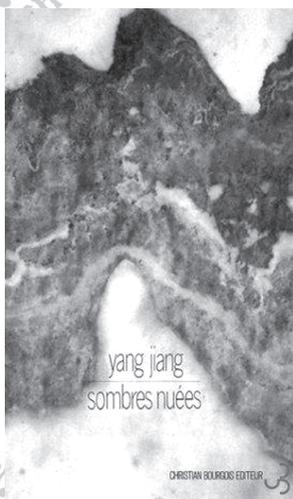
杨绛写了一本关于丈夫钱锺书的书，包括关于小说《围城》里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我翻译了这本书，并把它寄给了布尔瓜瓦，他回复说他可以出版这本书。我给杨绛写信，告诉她我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出版方布尔瓜瓦也同意出版了。她却给我发了一封传真说她不想出版这部书。我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很震惊。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她的一封信。信中表示非常感谢我翻译了她的书，抱歉她说话非常直接，语气强硬，但是她还是坚持这本书不能出版。这件事过了二十五年，一直不能出版。去年她辞世了，享年一百零五岁。

**钱：**杨绛的文风是中国知识分子读者群非常欣赏的。她的品格也令中国广大知识者敬佩。钱锺书杨绛夫妇在中国知识界、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不知他们的法文翻译作品在法国有着怎样的影响？销量如何？

**安：**我翻译并出版的杨绛《丙午丁未》这本书，在法国批评界大受好评。《自由报》头版专题作了介绍了，具体销量我不清楚。



杨绛《杂忆与杂写》法译本书影



杨绛《丙午丁未》法译本书影

何：我任法国南方文献（Actes Sud）出版社中国文学丛书主任，知道这个丛书出版的图书的销量。但是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作品我也不清楚。出版商不会将销量公之于众。

安：不过现在有这样一种付费软件，可以查到具体卖了多少册，因为出版商通常不会将真实的销量公布出来，要么多报，要么少报。这个工具叫作 Edistat，可以查到一本书从出版至今，一个月内，一年内的销量。我尝试过几次，数据很可信。它是调查了商店和书店真实卖出的册书的，我们甚至可以知道这些书究竟是从哪里卖出去的，是大超市、大商场还是小书店。唯一的问题就是需要付费。

何：杨绛作品的出版还涉及个人因素，即杨绛和出版商的私人关系。为什么这本书或那本书出版，很多时候都是个人因素左右的。比如，如果不是因为布尔瓜瓦和钱杨关系密切，《杂忆与杂写》这本书可能根本不会出版。因为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里面都是很零碎的杂文和感想。但是这里面有个人因素。

钱：这么说，翻译杨绛不是你们译者的选择，而是杨绛本人和出版方的共同意愿？

安：《杂忆与杂写》确实不是我们选择翻译的。有一天布尔瓜瓦给我寄来了这本书，问我感觉它合不合适翻译出版。我们读了之后告诉他，说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非常有意思，另一部分对于法国人来说太过专业了。于是他说好的，我愿意出版，于是我们签了合同，决定出版。不过我愿意翻译这本书，还是因为我对它感兴趣，觉得它很有意思，它是一份回忆录。

何：事实上，翻译作品的出版并不总是理性的，这其中有偶然因素，有个人因素，等等，所促成的。

钱：杨绛作品的翻译选择，首先是出版社决定的？

何：《杂忆与杂写》是这样的，不过《丙午丁未》不同，是你自

已选择翻译的吧？（对安）

钱：是因为安必诺先生喜欢杨绛的文风？

安：我主要是对政治感兴趣，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但又不是完全漫画式、负面描写“文革”，她也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这点很有意思。其中有个“金边乌云”的比喻，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乌云，也要看到乌云周围的光明。我就是对这个感兴趣。

何：这非常儒家，非常哲学，非常有中国风格。我喜欢更加直接的东西。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这样的特点：喜欢看到积极的一面。

钱：是的，这一特点，确实是值得肯定，非常可贵的一面。继杨绛之后，你们合译的该是余华了，是吗？

何：我刚到出版过很多外国文学的南方文献（Actes Sud）出版社就任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推荐余华。当时余华已经有一本书翻译出版了，出版社是菲利普-毕基耶（Philippe Picquier）。出版的是一本《世事如烟》文集，里面有两篇中篇小说。当时余华在法国已经有了自己的经纪人。他的《活着》也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经纪人一直在寻找对作者最有利的出版社。他认为由规模更大的南方文献（Actes Sud）来翻译出版余华的作品，要优于毕基耶出版社。我当时刚当上丛书主任，余华的经纪人给我推荐《许三观卖血记》。我之前读到的是手稿，不是正式出版的书。经纪人推荐了这本书，我说我读过，非常喜欢它。不过第一个翻译余华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纳蒂纳-佩蓉（Nadine Perront）。后来还有一位女译者雅克琳娜-桂娃莱（Jacqueline Guyvallet）也翻译了余华的作品，包括《在细雨中呼喊》、《古典爱情》（中篇小说集）和《十八岁出门远行》（短篇小说集），都是南方文献（Actes Sud）出版的。但问题是，这位女士身体不好，不能翻译大部头的作品。所以《兄弟》的翻译就由我们俩承担了，之后我们就成了余华的法文译者。假如这位女士没有生病，她估计会继续翻译余华。后来我们还翻译了《十

个关键词的中国》和《第七天》。所以，我们成为余华的译者多少有些偶然。我们只用了一年时间就翻译了《兄弟》。我开始是余华的出版者，而不是翻译者。不过出版余华是我自己决定的。

钱：不过你们是后来居上，你们翻译的《兄弟》反响很大。我就读到法国友人寄给我的法国报刊发表的不少评论，也看到一些中国学人对你们译本的评论。有没有再版呢？

安：法译《兄弟》首版是5000册。这已经是很大一个数目了。如果卖出5000册，简直可以庆祝一番。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售出50000册了。余华还获得了国际通讯颁的奖，并且去法国领奖。出版社根本没有料到这本书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开始他们发现这本书卖得不错，预估能够卖到20000册，最后居然卖到50000册，简直出乎意料。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说尤其不可思议。我搜集了各刊物上对这本书的评论文章。尤其是，《兄弟》上了《世界报》头版头条，这是前所未有的：头版宣布余华作品出版，里面还有两版专门谈论这本书，也就是说有三版都是关于《兄弟》的。浙江有个余华研究中心，它的网站翻译了《世界报》的这篇文章，现在可以读到。

钱：余华是我国新时期文学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卓越的知名小说家，在我国读书界拥有广大的受众，深受读者的喜爱。我记得，2005年4月，我在复旦大学“中法文学相遇”的法中学者论坛上和余华有过一次交流，感到他对社会和人生和文学创作都有独到的思考和见解，且热情而博学。二位写过评论余华的文章吗？

何：我写了两篇文章。

钱：你们如何认识、评价余华呢？你们翻译他的小说，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呢？

何：我的两篇文章，第一篇写在《兄弟》出版之前，文章叫作《余

华和闹鬼的空间》，讲的是余华作品中的空间，出现的鬼魂。另一篇分析文章，谈的是余华的一本小文集，书名为《内心之死》。文集谈的是外国文学。他写了一些关于外国作家的文章，事实上他只读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从来不写关于中国文学的东西。我试图理解他为什么选择读这些作家，为什么他对这些作家感兴趣，他是怎么理解他们的，这与他的写作之间有何关系。

钱：这很有意义。余华这一代相对你们之前研究的巴金、沈从文、京派海派和杨绛、钱锺书，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作家了。这一代作家的风格和文学价值、审美追求及其社会意义，与其前辈已不尽相同了。余华也是中国知识者读者群比较喜欢的一个作家，请问你们二位对此有什么看法？

何：他们不是一代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对我来说有着距离，有着真实。这些在今天的中国文学中逐渐丧失了，我觉得很遗憾。今天的文学充满了暴力、放纵。老实说我不太喜欢当今的中国文学，我不喜欢莫言，也不怎么喜欢阎连科。我还挺喜欢格非的。他的作品还挺好的，重新找回了一些古典味道，比如《山河入梦》就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作品。

安：我把我的《兄弟》翻译寄给了我的经济学导师，他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意思。我有好几个朋友也觉得这部小说有意思。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四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什么。余华说，欧洲用了四个世纪发生的事情，中国只用了四十年。很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都会在文章中引用《兄弟》的文字。我的经济学论文导师是一位著名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家联谊会（Cercle des économistes）的会长。他想邀请余华与经济学家们见面，请他谈中国经济。他觉得余华的书是一部难以想象（incroyable）的中国资料。经济学家研究余华的小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法国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当然是个特例。

何：不过，我在《兄弟》中看到了别的东西。我认为余华的伟大

之处就在于此。《兄弟》不仅是一轴描绘中国的画卷，也是两个命运迥异的兄弟的故事。在我看来，余华作品的主题是非常形而上的：谈论的是命运、死亡，这是余华作品的基本主题。如果不是这一点，他的作品不会有如此的力量。余华作品的力量在于对生命意义、对死亡和命运的思考。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同样的主题。有人说他的作品分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每个阶段都不同，我认为并没有。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关于死亡的，《第七天》，我觉得这部书非常有颠覆性。这是一本带有某些悼念意味的书，关于生命的苦难。他想象人死之后便获得了和平，人们团结在一起，暴力消失了……我觉得非常感人。然而死亡永远都在，彼岸永远都在，尽管他不信教，但是他的作品有着这样的终极关怀……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品质使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总是要有一些高尚的视野。总之，我在《兄弟》中看到了两样东西：一是对中国社会的写实描绘，二是两个兄弟的生命历程。对余华来说，命运这个主题非常重要。有一次他对我说，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遇到自己当年的同学，他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因为他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获得了成功，但是看到有些老同学活得非常不幸，失业……他说他感到非常难过。一方面，他自己成功了，成了知名作家，另一方面，他的老同学没有获得成功，生活得很悲惨。在《兄弟》一书中，两兄弟一个变得极为富有，另一个一无所有，最后自杀了。余华总是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这就是人类不同的命运。这样的思想非常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他对人类的苦难表现出非常之同情。

钱：何教授对余华《兄弟》的解读和评析，确实如你先生所说，是“很文学”的，很到位。为什么余华作品在法国的接受获得如此成功呢？或许这正在于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充盈着感人的、浓烈的人文情怀和人文主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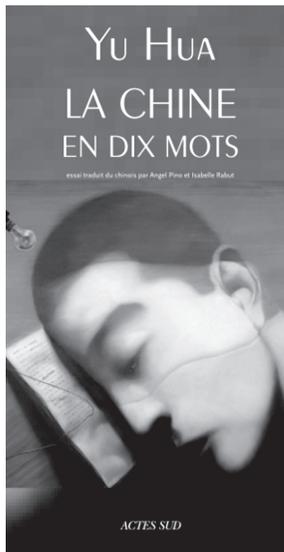
YU HUA  
BROTHERS

ROMAN TRADUIT DU CHINOIS PAR ANGEL PINO ET ISABELLE RABUT



PRIX COURRIER INTERNATIONAL  
DU MEILLEUR LIVRE ÉTRANGER 2008

余华小说《兄弟》法译本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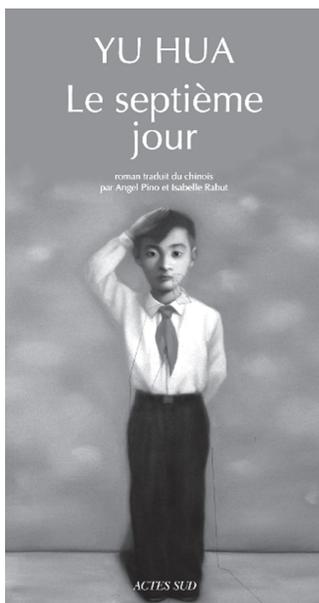


YU HUA  
LA CHINE  
EN DIX MOTS

essai traduit du chinois par Angel Pino et Isabelle Rabut

ACTES SUD

余华《十个关键词的中国》法译本书影



YU HUA  
Le septième  
jour

roman traduit du chinois  
par Angel Pino et Isabelle Rabut

ACTES SUD

余华小说《第七天》法译本书影



YU HUA  
Sur la route  
à dix-huit ans

nouvelles traduites du chinois  
par Jacqueline Guyajiet,  
Angel Pino et Isabelle Rabut

ACTES SUD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法译本书影

何：两个原因，一是他很好地讲述了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历史，二是他写的是能够打动人的东西，是普世的东西，关于死亡、命运和不幸。所以他作品里有着某种非常感人、人文的东西。

安：但是这并不够。他的作品在法国获得接受和成功，但在美国却不成功。我想这里面有翻译的原因。

何：我一直能感受到余华从第一部作品中就散发出来的人文主义，尽管表面上它是那么残酷和血腥，但我还是能从中感受到人文主义的气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

钱：这就是为何罗曼·罗兰的作品总是受到我国不同时代读者喜爱的原因。这正是人文主义的魅力吧。

何：另外《兄弟》的结构也很出色。它不像茅盾的作品那样，里面出现十几个人物，甚至莫言也是，小说里面有很多人物。余华的《兄弟》只有两个主要人物，其他人都是以从事的职业来命名。很少的人物却能描绘整个中国。小说的结构组织得非常好。从头到尾就是两个人物，以及与他们父母、恋人和其他有联系的人物。这就足以描述中国五十年的历史。因为只有两个主人公，我们的注意力就能够牢牢放在他们身上，关注他们的生活，关注他们的命运。假如要用很多人物来描绘中国，代表它的各个阶层，我们可能会感到厌倦。我们会觉得复杂，记不住那么多的人物和人名。《兄弟》就不是这样。好多人告诉他们是从头一直读到尾的，他们关心这两个人后面发生了什么。所以从结构角度来说，这部小说非常出色。

钱：何碧玉教授对余华《兄弟》的思想艺术特色的领悟和把握，非常深刻、全面而准确，分析到了点子上。余华作品和池莉小说在法国的传布和接受，较之在欧美其他国家乃至比在作者本国大获成功，一如必诺先生所说，这里面有翻译的原因，有译者、媒介的接受及国别读者不同的阅读趣味和审美取向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考量吧？你们认

为呢？

安：我想是这样的。对法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是需要长时间的调查，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兴趣所在。况且，读者群也不是整体划一的，其兴趣走向，也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具体加以分析，人们可以依据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受教育的程度，加以归类。据说，在中国，文学品位往往深受约定俗成的观点所影响，尤其受到大学教育的影响，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区分仍然存在着。池莉曾告诉我们，那些欣赏她作品的年轻读者往往在进了大学后就改变了主意。大学是提升了还是扭曲了他们的品位？事实上，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包括一些大学教师告诉我们，他们欣赏池莉的作品，至少是欣赏她的一部分作品。法国读者显然不受约定俗成的观点所左右。他们读池莉的小说不会感到难为情，池莉在法国并不被视为通俗作家，也许是因为她带来了关于中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当然，并不是池莉的每一部作品都被译成法文，出版社的选择及译者的翻译方式会对她的作品的接受产生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当下的法国对中国当代作家的接受是分等级的，这一等级的形成与批评界和媒体有一定关系，对于法国批评界而言，莫言和余华处于比池莉更高的位置，这从人们谈论他们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来：人们将他们俩列入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列，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伟大的作家”列表。不过，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成功正来源于他们既创造了极具原创性的世界，也为人们观察中国提供了特殊视角。

至于审美趣味问题，我们发现，中法读者间的审美趣味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法国人可以以比较露骨的方式谈论性，但很难接受在当代中国作家笔下大量出现的与排泄有关的字眼。大量中国当代作品因为太过暴力或过多地谈到身体的功能（如排泄、呕吐），让法国读者感到不适。这对于产生了拉伯雷的国度，也许是一种悖论，但事实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拉伯雷生活在16世纪——法国人的品位被雅化之前，而当代法国人的品位基本形成于17世纪。另一个交流的困难来源于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一位网友在评论莫言的一本书时说，

他的思维也许太过笛卡儿化，以至于无法欣赏莫言的作品。我们觉得这个观点很有意思。确实，一旦幻想变得有些许妄语的色彩，法国人在进入这种幻想时就有些困难。不过，这一推论也有其局限，因为某些法国读者恰恰相反，他们很欣赏“脱了缰的”激情，而有些中国读者则不喜欢这种激情。说到底，一旦我们想把不同的读者对立起来，我们很快就面临着自相矛盾。具体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

**何：**事实上，法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并非是平面化、单一性的，而是多角度、多层面的。他们读沈从文的《边城》肯定是从美学层面的接受，而《兄弟》在法国非常畅销，这更是因为法国读者想要通过这本书，了解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的演变，这本书是很好的缩影，所以很多经济学家也对这本书感兴趣。余华说过，《兄弟》出版的时候很多批评家批评我的书，可是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我的书是必读的，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这本书。这可能是作者的一句调侃的玩笑，但也有一定道理。法国经济学家丹尼尔·柯恩（Daniel Cohen）的著作中有一章是关于中国的经济，就提到了余华的《兄弟》和《十个关键词的中国》，他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加以接受的。当然读者喜欢余华还有多种文学和美学的诸多原因。我的一位东方语言学院中国同事告诉我，她读《兄弟》的时候感动得哭了。余华的故事很能打动人，我想法国读者和中国读者一样会被他的故事所感动，人心是相通的。我记得法文《兄弟》出版引起了法国多方关注和主流媒体的一致好评。法国各大报纸如《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等，几乎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宣传他的书，《世界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余华：展现中国赤裸裸现实的作家》的报道，其反响确实非同一般。

**钱：**精彩，好极了！你们对余华和池莉在法国的接受与影响介绍得非常具体全面，特别是对译者、媒介的审美取向，以及中法读者之间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的差异性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观察，都有独到的领悟和深刻的见解，使我们深受启迪、受益匪浅。再次感谢二位

不辞旅途辛劳前来看望老朽，现身说法，讲述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之所见、所得，与我们一起重温二位投缘中国文学点点滴滴的往事，分享你们俩与中国现代文学结缘四十载的美好时光：相遇巴金、沈从文，译介、研究京派海派，翻译余华、池莉、杨绛等名家的喜悦和经历，以及鲜为人知的花絮。

